

西方学者关于移民城市适应性研究的理论综述

□钱 锦

(深圳博物馆 深圳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心, 广东 深圳 518026)

摘要: 自从工业化革命,特别是第二次工业化革命以来,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其结果之一就是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对于移民流动的原因、适应策略等,西方学界进行过诸多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中国自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迅猛发展,户籍制度大幅度松动,大量移民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中小城市流向大城市,他们成为城市不可否认并且急需接纳融合的一部分。因此,西方学者关于移民城市适应性的研究值得借鉴学习。

关键词: 移民; 城市适应性; 理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47 (2010) 03-0205-02

自人类诞生以来,定居和迁徙一直是人类生存策略的两个必然选择。然而,自人类历史开始至今,伴随着20世纪第二次工业化革命的移民浪潮,其规模可谓空前盛大,并且仍在持续发展之中。新的城市生活对于移民来说并非是一帆风顺,而是由一连串超负荷的遭遇组成的,其结果就是适应。它使日常生活角色扮演冲突、社会规范演变、认知机能和稀缺资源的分配使用等诸多方面发生变化。西方学者进行过诸多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其结果相当值得借鉴和学习。

一、移民流动的动因

关于移民流动动因的理论,比较有影响的理论有莱文斯坦(E.G.Ravenstein)等人提出的“推—拉”理论,即移民并不是完全无序盲目流动的,他们是因为迁出地的不利因素导致的“推”力和迁入地的各种有利条件形成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刘易斯(W.A.Lewis)提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在一个由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组成的二元结构的经济中,农业人口过剩,人均产出边际效益为零,即与农业部门最低生活水平相等,因此,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超过上述最低生活水平以上的工资,那么农业部门就会向工业部门无限提供劳动力,直到农业部门的边际效益增大为正数。(刘易斯,1945)钱纳里(H.B.Chenery)和赛尔昆(M.Syrquin)提出“多国模型”论,他们通过研究多个国家的城市化过程,提出了城市化率和人均GDP的一般对应关系。(钱纳里、赛尔昆,1988)这些理论从宏观层面上能够比较有效地解释移民外出的原因,但它们的缺陷在于忽视了移民作为主体存在的能动性。其他一些学者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主动移民的动因问题上。以拉里·萨斯塔(Larry Sjaastad)、迈克尔·托达洛(Michael Todaro)等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移民行为的动因。他们通过定量分析得出移民是通过比较

迁出地和迁入地工资差别并通过对付出和回报的估算最终来决定移民行为的。以奥迪·斯塔克(Oded Stark)、爱德华·泰勒(J.Edward Taylor)等为代表的新经济移民理论学派认为,引发移民行为的动因不是迁出地和迁入地绝对收入的差距,而是基于和参照群体相比较之后产生的相对剥夺感。迈克尔·皮奥雷(Michael Piore)所代表的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学派,他通过分析发达国家市场结构发现,现代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双重劳动力市场,需要国际移民来提供本国移民所不愿意从事的下层劳动力市场。在此基础上,艾勒占德罗·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和罗伯特·巴赫(Robert Bach)进一步提出了“三重市场需求理论”。他们在双重劳动力市场上增加了一个“族群聚集区”,即移民族群通过这一经济圈在引进廉价劳动力增强产品竞争力的同时,成功移民企业家对迁出地居民又起了示范作用。埃罗·里克特斯(Erol Ricketts)、莎里·E·芬德利(Salley E.Findley)、萨斯凯·萨森(Saskia Sassen)等人通过研究发现,人口的跨境迁移与全球化态势有着密切的联系,商品、资本和信息的国际流动推动了人口的迁移。(李明欢,2000)吉登斯(A.Giddens)的结构化(structuration)理论认为,外出或转移既不仅仅是制度性安排的阻碍或推动,也并非简单地只是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选择,而是主体与结构二重化的过程。(吉登斯,1998)

二、移民的城市适应策略

无论他们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原因是什么,移民们要面对的,就是必须适应上述与乡村差别甚远的“城市性”,从而在城市中生存乃至生活下来。“美国社会学家高斯席德(Goldscheider·G)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移民》一书中认为:‘移民的适应可以界定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移民对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作出反应。从农村到城市常常包含了这三方面的变化。’”(朱力,2000)高斯席德

[收稿日期] 2009-09-23

[作者简介] 钱锦,女,浙江宁波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硕士研究生,现供职于深圳博物馆深圳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心,研究方向:族群与区域发展史。

的定义强调适应是一种行为，是外来移民在变化的环境中做出的持续的调整。

关于移民适应性的文献汗牛充栋，总体上按其基本取向，大致可以梳理出“同化论”和“多元文化论”两大流派（李明欢，2000）。帕克将同化视为“群体和个人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过程，即个人与群体从他群体获得记忆、情感、态度，并且共享他们的经历和历史，逐渐融汇成共同的文化生活。”（徐杰舜、周大鸣，2002）他还将同化过程分为接触、不稳定合作和融合三个阶段。与之类似，其他支持同化论的学者认为，无论来自何地何种族何背景的移民一般要经过定居、适应和同化三个阶段的适应过程。要进入社会的主流，他们不仅要接受和适应当地的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观念和习惯，还必须在教育和职业方面取得成就，才能获得社会认可，进而实现同化和融合。移民与主流社会居住的隔离程度越高，其社会经济地位就越低。周敏通过对唐人街的研究发现，当移民获得一定的经济地位并且有实力之后，就会搬离民族聚居区。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脱离了该社区，反而他们仍然保留着与其千丝万缕的经济和社会关系。支持“多元文化论”的学者认为，不同民族的移民群体可以按各自适应的不同方式生活在一个国家里。他们用各种文化和价值观念重新塑造他们的生活地点，隔离区的形成实际上是一种占据优势地位的文化得到发扬的结果。这有助于建构多元化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提出农村流动人口对城市生活的适应包括三层涵义：首先是系统层面的整合，即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制度等四者相互衔接，农村流动人口在各方面被城市所接受。其次是社会层面的整合，即农村流动人口在生活方式以及行为上与城市居民不存在明显差别。最后，农村流动人口在心理上对城市拥有归属感。（王春光，2006）

三、移民的城市生活

都市人类学者做了大量的关于移民群体的社会适应性研究，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托马斯（William Thomas）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他通过研究从波兰乡土生活到美国芝加哥这个大都市生活的波兰农民的家庭书信和生活史，描述了在这重大变迁过程重，这些农民在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上的变化，提出了必须把个人态度和社会客观文化的价值观结合起来，才可以充分理解人的行为，从而了解移民群体的社会心理与城市生活适应性。

从田野调查角度讲，都市人类学家采取的主要方式都是深入某一个移民群体内部进行研究。福斯特（George M. Foster）和其学生坎帕（Robert V. Kemper）在《城市中的人类学田野工作》（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in Cities）中回顾了人类学传统田野工作的发展过程，他们认为应当将迁移到城市生活的农民作为新的研究对象。社会学的调查方法，比如问卷数据等，也应当被运用于对整体情况的描述和分析。此外，他们倡导在研究中对于人类学家传统中立角色的再评价。比如怀特（William Foote White）在他的《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的前言里，就将自己中产阶级的身份以及个人经历甚至爱好交代了一遍。

人类学的一些传统研究方法比如参与式观察等仍然具有其必不可少的意义。同时，人类学的一些传统研究方法比如参与式观察等仍然被都市人类学家所运用。例如除了怀特的《街角社会》，坎帕（Robert V. Kemper）跟踪调查了一批到墨西哥城的农民，研究了他们在居住行为、群体组织、对城市生活的心理调试等一系列适应策略。这些拉丁美裔农民在习得和适应城市生活时，更依赖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直系亲属。可以说，他们实质上形成了一种空间上的扩大式家庭，包括了原来的村民和移民。诸如此类的研究还有很多，例如西米克（Andrei Simc）从一个叫波登（Bogdan）人从乡村移居到城市的个案展开，研究了农民家庭是如何适应城市生活的。他发现，当城乡文化价值观差异不大时，沃思所指出的那些社会病（social pathology）或者社会解组（social breakdown）现象就很少发生。

四、结语

总体来说，和社会学家、人口学家以及经济学家一样，大量的西方人类学家关注移民问题，并且做了相当全面的研究。都市人类学家更关注的是那些从乡土社会迁移到工业城市的移民。他们深入移民群体参与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去了解他们移民的动机、行为，以及来到城市后，面对巨大的城乡差异，所采取的行动，是如何使他们能在城市中获得工作、住房、食物等经济资源，通过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展开他们的社会资源和调整心态接受城乡差异。西方学者对于移民城市适应问题的研究，在笔者看来，主要还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和新经济制度学的交易费用理论。也就是说，无论是从宏观还是微观层面上，他们在考察移民的迁移动机和城市适应策略及行为时，都将移民看成是期望获得最大利益的理性行动主体。社会制度、城乡文化是移民在适应城市生活中必须克服的障碍，处于经济、文化和人力资本弱势地位的移民群体主要还是利用血缘、地缘等社会网络关系获得在城市生活的各项资本。这种理论价值取向和研究方法的问题就在于忽略了移民过程的整体性，即多单向地从被动的适应着眼，而忽略了移民文化向城市文化的主动嵌入过程。都市人类学者所做的研究一般为一个社区或者单个族群，这也是由于传统研究方法所限制，所以如何整合宏观层面上的城市适应性理论与微观层面上的实证研究，仍然是值得思索和尝试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W.A. Lewis.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4.
- [2] Geoge Gmelch. Walter P. Zenner. Illinois: Waveland Press, Inc. 1996.
- [3] 钱纳里，赛尔昆著，李新华等译。发展的形式：1950-1970。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
- [4] 李明欢。20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总第144期。
- [5] 吉登斯。社会的构成。北京：三联书店，1998。
- [6] 朱力。论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江海学刊，2002（3）。
- [7] 徐杰舜，周大鸣主编。中国的族群与族群关系。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白 沙